

财经
学术文库



朱东平 著

从现代企业理论看

CONG XIAN DAI QI YE LI LUN KAN

所有制与效率

SUO YOU ZHI YU XIAO LU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 财经学术文库 ·

从现代企业理论看
所有制与效率

朱东平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盛松成

封面设计: 龚 鹰

从现代企业理论看

所有制与效率

朱东平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国定路 777 号 邮编 200433)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望亭发电厂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5 插页 4 字数 177000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81049-006-0 / F·02

定价: 19.40 元

前 言

近年来，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我国在内的几乎所有曾经是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都先后以不同形式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有些国家甚至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实施了所谓的“私有化”。

对这些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化，经济学应该如何去理解并作出说明？这个问题构成了笔者研究这一课题的初始动机。

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这些问题，都是经济学研究中争论已久而又极其重要的问题。但是，源于西方、立足于西方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学，却并没有象对待其他问题那样，对这些问题展开认真和严肃的讨论。偶有论著，也难以引起大范围的共鸣。在那里，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私有制优于公有制似乎已经是一种常识性的结论。

此外，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还出现了这样一种非常简单的逻辑：由于现实生活中的计划经济正在向市场经济靠拢，同时又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私有化，因此，计划经济劣于市场经济，公有制劣于私有制。也就是说，存在便是真理。

笔者的直觉是，任何一种制度的成功与否，是与非，都应该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是这种制度本身是否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其二是这一制度在其实际操作过程中是否存在严重失误。如果从这一角度去理解上述现实生活中的变化，那么很显然，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

从这一直觉出发，一方面是为了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理解当前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是试图向现代经济学研究中不太为人所问津的这一领域作出挑战，笔者自三年前开始了对上述问题的探究，并以此形成了博士论文。现在，又对博士论文作了修改和增补，将它奉献给读者，以就教于各位同行。

构成本书核心部分的章节，均是笔者近三年来先后在国际和国内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也可以说是对笔者近三年研究过程的一个小结。

一、本书的形成

本书命名为“所有制与效率”。

在我国，所有制问题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因为，谈论所有制，谈论所有制的改革，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私有化”这一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但是，在积极探索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的今天，所有制问题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经济学和享受着 GNP 的经济学者有义务从正面研究并回答这一问题。

但同时，即使是在经济学范围内，所有制问题也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和多侧面的综合性问题。就这个意义而言，穷尽笔者毕生的精力也不可能完成对所有制问题的全面描述。本书只是从一个非常狭小的侧面——效率的侧面展开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其结论均具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它们都只能在本书所限定

的经济环境中才能成立。这一点，务请读者在一开始便予以足够的注意。

在“所有制与效率”这一表述下，包含着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其次，如果这种联系存在，那么，不同所有制形态与效率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因果关系？本书将紧紧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分析，并试图以此探索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

本书的分析线索如下。

出于笔者研究这一问题的初始动机，本书首先在严格区别作为一种经济体制的计划经济与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计划经济的基础上（笔者将前者称作“理想的计划经济”，将后者称作“现实的计划经济”，并与此相对应，将市场经济也区分为“理想的市场经济”和“现实的市场经济”），使用现代经济学的标准模型，在一种特殊的理论环境下，分析和比较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种经济体制在其理想形态上的优劣问题。其结果，证实了笔者的直觉——就社会福利这一标准而言，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并不劣于市场经济。并由此进一步指出，现实的计划经济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问题，即宏观经济的不平衡问题和企业的效率问题。而这两个基本问题的生成又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在其实现过程中，无法满足为这种经济体制所必备的两个基本前提——完全的信息和社会成员高度的思想觉悟。也就是说，如果说计划经济这一经济体制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形态——现实的计划经济，劣于市场经济这一经济体制的现实形态，那么，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在于计划经济这种经济体制本身，而是由于计划经济的这种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相比，其必需的前提条件在现实中更难得到满足。

应该指出的是，理想的市场经济在其实现过程中，它所必

需的前提条件也同样没有得到足够的满足。因此，现实中的市场经济也同样存在着许多问题。这样，为了回答“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这一问题，事实上有必要对这两种经济体制的现实形态作出说明和比较。

遗憾的是，现实的计划经济与现实的市场经济之间的优劣问题，在迄今为止的经济学研究中，并未得到严格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明。这主要是由于，这两种经济体制的现实形态在不同国家中千差万别，很难从中抽象出具有典型意义的理论形态，因而很难对它们进行宏观意义上的，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同时，也是为了能够在较小的篇幅中，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积极的、具有建设意义上的思路，笔者在本书中放弃了对这两种经济体制的现实形态在宏观意义上的比较，而将分析的焦点收缩到存在于现实的计划经济中的基本问题之一——企业的效率问题上。试图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出发，从一个侧面，间接地折射出这两种经济体制在其现实形态上的差别。

那么，怎样考察这两种不同经济体制下企业的效率问题呢？

为此，首先必须明确这两种不同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特征。我们知道，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由中央与地方计划当局编制关于整个经济的几乎全部的宏观、中观与微观计划，并通过一系列行政手段使之得到贯彻和执行。为了保证这些计划能够在经济生活中得到不折不扣的实现，首先必须尽可能地消除各种经济主体的特殊经济利益。而经济主体的特殊经济利益通常又都是与所有权密切相关的。因此，为了保证计划经济的顺利运行，在计划经济中，所有权必须从多元走向一元。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的内在要求是，全社会只有一个所有者（尽

管实际上这一要求不可能得到百分之百的满足)，而且这个所有者还必须同时就是计划者，它必须能够完全地控制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企业。出于这一原因，在现实的计划经济中，这个所有者通常都由作为整体的全民或者说由国家担任。因此，笔者将计划经济下企业的基本特征抽象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

与计划经济相反，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各种具有不同经济利益的主体在市场上交汇，通过市场对这些经济主体的利益调整，使经济走向均衡。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反而成了必备前提。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为了体现市场经济的这种对不同利益主体的要求，自觉地在国有企业中进行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等一系列改革。应该说，这些改革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的。但是，只是停留在这一点上又是远远不够的。从本质上说，由于市场经济要求不同利益主体的存在，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利益主体必须从一元走向多元。也就是说，市场经济要求不同所有者（和不同产权主体）的存在，而且这种不同所有者（不同产权主体）的数量越多，市场的竞争性就越强，整个经济的运转通常也就更为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说，完善的市场经济必须以多种所有制企业，包括公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的存在为前提。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为了分析上的方便，笔者在本书中将这一目标模式抽象为坚持公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并且，进一步将公有制抽象为全民所有制或者说国家所有制。这种坚持公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将允许私有制企业，而且是较多数量的私有制企业的存在，同时也将允许原国有企业中一定比例的私人所有者出现。笔者在本书中将这样的所有制结构称作“混合所有制”。

由于市场经济要求不同所有者的存在，而且，为了体现这种不同所有者的存在，同时也是为了使市场机制更加有效地运转，在市场经济中必须允许存在一定数量的私有企业。因此，笔者将计划经济与现实的市场经济下企业之间的区别近似地归结为所有制形态上的区别，也就是说，归结为单一的公有制与混合所有制或私有制的区别，从而将对不同经济体制下企业效率问题的比较，进一步收缩到不同所有制下企业效率问题的比较上。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书定名为“所有制与效率”。

那么，如何衡量不同所有制下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呢？

在理论上，出于分析目的的不同，所使用的效率标准也多种多样。但在对企业自身的效率进行评价时，常采用利润这一指标，而在评价企业的宏观效率时则采用社会福利或者社会总剩余这一概念。此外，由于在所有权与经营权互相分离的现代企业中，利润的多寡常常取决于经营者的努力程度。因此，以经营者的努力程度来评价企业效率好坏的方法也多有使用。

应该说，这三种标准之间是互不矛盾的。因为社会福利或社会总剩余是由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所构成的，而其中的生产者剩余即为利润。但同时，这三种标准又不是完全相同的。首先，经营者努力程度的大小并不是决定企业利润多少的唯一源泉，同样，企业利润也并不是决定社会福利的唯一因素。其次，这三种标准在经济理论中的重要性也是不同的。在现代经济学中，社会福利这一概念是衡量所有事物优劣问题的最终标准。因此，本书在可能的情况下，都使用社会福利这一标准。但由于逻辑展开上的需要，在不能明确比较不同所有制下社会福利的大小时，笔者也不得不采用利润，甚至经营者努力程度等微观层次上的标准。

因此，可以说，笔者对现在成了本书课题的“所有制与效

率”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在为了考察“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这一初始动机的基础上展开的。但这一动机毕竟只是笔者研究这一课题的初始动机。由于种种理论上的困难，本书未能完全实现这一初衷，而是将分析重点转到了对所有制和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试图使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现代经济学至今尚未认真予以研究的所有制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并试图以此服务于我国目前的企业改革。

二、本书的研究方法

记得刚刚跨进大学校门的时候，老师对我们说，经济学是一门经世济民的学问。后来，导师又对我说，经济学是一门不夹带任何个人感情的“冷酷”的学问。因此，我现在对学生说，经济学是一门在撇除个人情感的基础上，尽可能客观地去理解和分析经济生活中的现象和事物，为政府的经济政策提供经济学依据的学问。

出于对经济学的这一理解，本书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下述特征。

首先是大量地借助于数学这一分析手段。应该说，逻辑思维过程基本上由数学手段来实现，乃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时常阅读国外经济学理论刊物或者书籍的读者都知道，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某一问题时，常常首先以数学语言描绘它所要考察的经济环境，然后便是大量的数学操作和演算。其结论的导出几乎都是通过数学这一手段而得以实现的。

那么，为什么在经济学研究中必须使用数学呢？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学所要考察的经济现实的错综复杂。我们知道，在现实世界中充满着种种不确定性。在这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又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矛盾和冲突。而且，这种矛盾和冲突

还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过程之中。如果说，任何经济中都存在着政府、企业和家庭这样三种基本经济主体的话，那么，这三种主体之间，以及无数个同类的主体之间，都会由于其各自目标函数的不同而存在种种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此外，经济运行过程本身也会不断地出现种种问题和矛盾。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制定各种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便是为了尽量地调和企业和个人之间，以及企业之间和个人之间的这种利益上的矛盾，并解决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使整个经济实现更大的社会福利。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以及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上述目的，决定了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的经济学研究必须使用数学手段。因为政府所拥有的任何经济政策手段，都有可能对不同主体的利益带来正负完全相反的效果。比如说，政府的反垄断政策，一般来说会使广大的消费者和其他企业从中获益，但同时它也会使原来的垄断企业蒙受重大的打击和损失。再比如说，利息率的提高会使储蓄者的收益上升，但也会使投资者的成本上升。此外，当政府围绕某些政策目标选择其政策手段时，还会遇到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对立。比如，稳定物价和经济增长这两个政策目标便是一对极难解开的矛盾。为促成经济增长的政策手段通常都会导致物价的上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矛盾的存在，要求经济学对政府的各种经济政策所可能带来的正负两个方面的效果进行测定和比较，以确定哪一种效果居于支配地位，并分析这种居于支配地位的效果对社会福利具有什么样的影响，从而决定经济政策的取舍。很显然，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依靠语言思维既是很难做到，又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但是，在强调经济学研究应该使用数学的同时，又必须同样地强调，数学毕竟只是经济学研究的一种工具，经济学决不

是数学。这是因为，经济学借助数学这一分析工具，只是为了逻辑展开上的需要。通常，在现代经济学中，任何一种研究成果的正确性及其理论和现实意义，都是由它的基本模型，而不是由它所使用的数学所决定的。在对模型的设定中，尽管常常使用数学记号，但这些记号背后却都蕴藏着丰富的经济学含义，隐含着作者对现实经济生活的细心观察和理解。模型设定结束以后的数学演算，只是帮助作者寻找在这种模型所规定的理论世界中，某种外生条件的变动所可能造成的影响。更何况，通过这种分析所得出的任何数学结论也都具有深刻的经济学含意。因此，可以说，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数学只是在基本模型所规定的种种前提下，起着“开山辟路”的作用。现代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终点均是不折不扣的经济学，数学在现代经济学中是一种分析工具，也只能是一种分析工具。

数学这一自然科学的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使经济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主观臆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数学的使用使经济学研究撇开了个人感情和主观愿望，赋予了经济学的客观性。事实上，人们在基本模型的设定阶段上，往往不可能知道从这一基本模型中会得出什么样的具体结论。反之，在模型设定阶段上便能对其结果一目了然的研究往往不会得到承认。

本书研究方法的第二个特征是，将分析范围严格地局限于经济学，而且是局限于经济学中的一个极为狭小的侧面或者角度。笔者始终认为，现实世界中的任何事物和现象都具有许多不同的侧面。从每个侧面都可以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但也只能揭示出其本质的一个侧面。因此，对同一事物，既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加以分析，也可以从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角度予以观察。正由于如此，才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开放的科学

体系，而且，这一科学体系还必将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日益得到发展。基于这一基本认识，笔者认为，经济学研究应该而且也只能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观察和分析事物，而不应过多地考虑其他诸如社会性、政治性等因素。否则，经济学也就不成其为经济学了。

另一方面，当今的经济学本身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由多种专业学科所组成的学科体系。这意味着，即使就经济学而言，也可以进一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展开对同一事物的分析。遗憾的是，任何经济学者都存在着精力和能力上的制约，因而不可能精通所有学科。所以，当他们分析某一问题时，往往只能从一个极为细小的角度来展开。同时，在分析技巧上，几乎能完全体现现实经济生活的理论模型，尽管从模型设定的角度讲也许是可能的，但这样的理论模型，或者是由于内生变量的过于繁杂，或者是由于函数的性质难于讨论，因而大多不可能从中导出具有明确经济学含意的结论。因此，即使就分析技巧而言，为了能够得出具有一定经济学含义的结论，也必须对现实世界予以一定的抽象，因而只能从某种特定的角度才能展开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考虑到这一“局限性”，本书在叙述某一结论时，常常会带有许多前提条件和定语，以明确这一结论的适用范围。

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这一特点意味着，在现代经济学中，任何单独的研究成果，其结论都建立在一定的理论抽象的基础上，因此，它们都不能也不应该被机械地套用到现实中去。事实上，这一点也反映了经济学的博大精深之处。正是由于任何研究都不可能穷尽其分析对象的所有侧面，都只能在某种特定的理论环境中才能成立，因此，才需要有整个经济学研究的协调配合，才需要有经济学的不断发展。

同时，经济学研究的这一特点还带来了现代经济学的另一特征，即前提的不可批判性。在现代经济学中，评价一篇论文或一本著作，只要它所设定的前提没有违背事实，只要这些前提之间的关系不互相矛盾，那么，不管它的抽象是如何大胆，其结论又是如何的“怪异”，都不会受到指责。因为，就前提条件的设定而言，只要它们不违背现实，而且各种前提之间又不存在矛盾，那么，这些前提便不存在正确与否的问题。相反，现代经济学推崇这种使用极为简单的模型而得出“非常识”性结论的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研究是一种经济学者对现实事物的感受能力和抽象能力的竞赛。能够以独特的角度去理解现实，并有效地进行抽象的研究才是最高水平的研究。读者不难发现，在国际一流经济学杂志上极少有批判性论文的出现，其理由也正在于此。

最后，本书研究方法的第三个特征是，一切从个人的理性行为出发。在传统理论中，分析的基本单位是企业和家庭。本书将这种基本分析单位进一步分解为个人。因此，在本书中，只存在政府与个人这样两种经济主体。每一种主体都以自己目标函数的最大化来决定自己的行为。

三、本书概要

本书由三篇共七章构成。

第一章描述全书的初始意图。通过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理想形态的比较分析，第一章指出，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它本身并不劣于市场经济。之所以需要对传统的计划经济进行改革，主要是由于在当前和可以预见的将来，实行计划经济所必须得到满足的完全的信息和社会成员高度的思想觉悟这两个基本前提还无法得到足够的满足。并指出，传统的计划

经济的根本问题之一是企业的效率问题。

在第一章所界定的本书分析范围的基础上，第二章综述了现代经济学中既存的种种企业理论，并通过对这些企业理论的介绍和比较，导出了本书将要采用的分析手法。第二章指出，出于分析企业效率的这一目的，也由于传统的计划经济出现种种问题的根源，在于信息上的不完全性和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本书将采用建立在不完全信息和个人的机会主义性质基础上的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手法。由于第一章和第二章承担着为全书的分析进行理论准备的任务，因此，笔者将这两章称作导论。

根据第二章所确定的研究手法，第二篇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对所有制与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分析。其中，第三章在一个特殊的经济环境中，考察了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所有制企业——国有制企业与私有制企业在效率问题上的区别。但是在这一章中，由于逻辑操作上的原因，使用社会福利这一标准来衡量这两种不同所有制在效率上的优劣非常困难，因而使用了经营者努力程度这一标准。在这一标准下，第三章指出，在它所假定的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努力程度将大于私有企业中经营者的努力程度。

鉴于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正在向混合所有制过渡这一趋势，第四章在一种完全区别于第三章的理论环境中，考察了理论上所能够想像的种种混合所有制结构。通过将这些混合所有制结构和与之相对应的完全的私有制进行对比，第四章指出，混合所有制的出现并不是单纯地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是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第四章还进一步分析了最佳混合所有制结构的问题，以及在混合所有制中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等问题。

在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作了初步的考察以后，第三篇又转而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角度展开对不同所有制下企业效率问题的分析。其中，第五章从一个只存在三个主体的极为抽象的理论模型出发，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分别比较了传统的公有制、个人所有制以及混合所有制这三者之间在效率问题上的优劣，从而再次论证了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合理性（尽管是有条件的），为第六章的进一步分析作了必要的准备。在此基础上，本着最大限度地贴近经济现实的要求，第六章将第五章中主体数为3的抽象模型予以一般化，在与第五章几乎完全相同的理论环境中，考察了主体数为 N 时的最佳混合所有制结构。第六章指出，在混合所有制中，物的资产在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分配取决于人口数和人的投资（或努力程度）的生产性。

在上述第三章～第六章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第七章将回顾全书所设定的基本理论环境，得出本书的主要结论，并指出这些结论所蕴含的现实含义，以作为对全书的总结。

四、谢辞

构成本书基础的博士论文，以及构成本书核心部分的已发表论文，都是笔者在日本学习期间的研究成果。因此，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在对原论文进行简化和修改的过程中，时常想起受业恩师——大阪市立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濑冈吉彦先生和星川顺一先生。可以说，没有导师们近于苛刻的严格训练和教育，上述研究成果、博士论文以及本书的完成都是难以想像的。此外，在长达近七年的留学生活中，服部容教教授、森诚副教授以及“周五研究会”的其他老师和师兄们都给了我大量的指点，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饮水思源，我还要由衷地感谢八年前给了我赴日深造机会

的上海财经大学和老师们的。是这一机会使我步入了现代经济学的大门。特别是，张淑智教授、李柱锡教授、裘逸娟教授等经济学系的老师们，从大学时代起，便在各方面给了笔者以无微不至的关怀。谨在此深致谢意。

在回国后的一年中，博士后工作站和国家教育委员会的“留学回国博士科研启动费”给予我许多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没有老母和妻子为我操持繁重的家务，本书的形成也同样是不可能的。本书献给可爱的女儿。